

//
《中共党史》讲稿
(供学员讨论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国际意义

肖 一 平

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已作了全面的总结。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著作中，也谈得不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这一部分的第四个问题，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五条。这五条，也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本文，是试图结合着学习毛泽东等同志的有关著作，对《决议》中这五条具体地作一些探讨和说明，谈一谈个人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历了三千来年的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起，中国就逐渐地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反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民经过长达一百〇九年的英勇斗争，才取得了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是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每次革命都失败了。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新的先进阶级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第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论是英国、荷兰型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法国、美国式的共和制度），在中国都已变成过时的斗争武器。中国人民需要新的斗争武器。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革命则发展成为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中国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彻底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统治，然后再经过人民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真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描写了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寻找革命理论的曲折过程。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经

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发展阶段，才取得了彻底胜利，并为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此外，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②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由此可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大家知道，理论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14页。

^②同上，第975页。

概括和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着和完善着，它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自己。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的思想武器。但有了好的武器并不等于战胜了敌人，还必须善于使用武器。对武器运用得好，才能削弱和战胜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如果不会或不善于使用武器，就打不到敌人的要害之处，甚至还会伤害自己。不论外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这种事例是很多的。

在我党历史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采取这种方法，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另一种是错误的态度和方法，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采取这种方法，革命工作是不会做好的，革命事业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实践证明，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做艰苦的努力。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它主要是反映西欧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那种类型国家的革命规律。因此，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而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就走过不少弯路，曾经历了一个由不会运用到逐渐学会运用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逐渐地学会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上胜利之途。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具体地谈到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逐步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历史过程。他说：“人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①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发表的一篇光辉文献,他告诉我们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正确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具体生动地概括了我党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曲折过程。

下面,概要地说明一下,我党是怎样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步步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在党的创立和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还只是初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特点、规律和革命的敌友关系,主要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主要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完备地制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

^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173—175页。

领导解放区全体军民，坚决以革命战争去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而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的指导下取得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话：“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①这是最扼要地正确表述了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九六〇年七月，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作过一次《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报告，他对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这样概括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②根据中国革命的情况，所说的“两头”，是指北伐战争时期和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至一九四三年六月这段时间。所说的“中间”，是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至一九三四年末。

在这里，需要指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不仅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的总路线和具体政策，以及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都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和决定，我党的内部事务，往往受到粗暴干涉。最典型的事例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从会议的决议到中央人事安排，

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175页。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都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由外国人指导中国革命，必然会出乱子。过去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有一份责任。尤其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责任就更大。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我党创建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功绩方面。上述事实说明，过去我党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因此，我党的创造性曾受到重大影响。自遵义会议开始，我党就能够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其他内部事务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我党的事情就很少干涉了。这是由于三方面的情况和原因：（1）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断绝了电讯联系，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召开遵义会议，可以“先斩后奏”。（2）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共产国际对我党内部事务，很少再硬性进行干涉。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规定以后一般不具体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这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意见，正确的就支持，不正确的就敷衍应付和置之不理。（3）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党的行动就完完全全地自由了。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有两个“独立自主”：一个是在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的独立自主；一个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的独立自主。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但我们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是经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花费了极大的精力。首先，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武器；然后，我们党又经过千辛万苦，逐渐学会正确运

用这一武器。这样，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文中，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归纳为“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经验，归纳为：“一个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条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征，就是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创造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独特性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独特性经验是什么呢？

总的说来，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

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贡献是很广泛的，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党全面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历史情况是这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他们处于资本主义上升年代，所以，还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当时他们所规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这一运动中，必须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自己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俄国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新策略。他明确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此而把这一革命及时地、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列宁的这一新的策略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正确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策略思想，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独特性经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发展，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农民问题。

中外历史都充分说明，农民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农民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基本力量。

在封建制度占优势的国家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都是占人口的绝对多数，因此，它往往是左右政局的一种力量，是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千方百计进行争夺的对象。在旧型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时期，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是利用农民，欺骗农民，当资产阶级一旦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便一脚踢开农民。法国大革命即是典型事例。那时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会丧失自己的小生产手段而变成无产者，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在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真正解放农民，先实现“耕者有其田”，然后再逐步地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由于农民问题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农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农民是革命力量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在俄国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列宁即提出“工农联盟”的口号。他指出，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农民已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由于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所以，列宁、斯大林主要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看农民问题的。他们把农民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①“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②因而，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待农民问题的政策比较简单，只是以宣布实行“土地国有”法令来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也没有进一步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只是实行限制富农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列宁提出了“农业合作制”的计划。到一九二九年，苏联共产党才开始全面推行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即将限制富农的政策改为消灭富农的政策。

①②《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26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曾被德、意、日法西斯占领和奴役的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大众，在苏联的援助下，在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曾发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国家，有的原先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有的是殖民地国家（如朝鲜、越南）。这些国家，虽然都先后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消灭了封建制度，但主要是依靠政府颁发土地改革法令，没有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斗争。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既与苏联不同，也与东欧和亚洲的兄弟党有别，我们自己的独特经验。

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是国家的主体。中国农民所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是极为惨重的。因此，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性很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的产业工人多出身于破产农民，即今天的工人一般都是昨天的农民，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有一种极为亲密的天然的友谊关系。这些因素和情况，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雄厚、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由此就充分表明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很重视农民问题。从大革命失败到全国解放，这二十二年的长时期，我们党一直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以主要力量去搞农民运动。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突出的鲜明的特点。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怎样处理农民问题呢？我们党在

这方面的独特经验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党是这样来看待农民的：不只把农民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革命同盟军，而且进一步地把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就是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司令官，农民是基本队伍。我国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农民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主要源泉。我们只要真正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动员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切敌人都可以打倒，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因此，可以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放农民。毛泽东同志过去经常讲的名言是：“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①这完全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我国革命的江山，主要是依靠农民打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是靠农民起家的，是靠搞农民运动起家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是同农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同农民是风雨同舟，祸福与共。这也就是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极为亲密的原因所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我们党虽然长期同工人阶级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但我国工农联盟的根基则是十分牢固的。这种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没有的。

（二）土地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同土地连在一起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解放农民，使其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作用，就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这是农民的急迫要求。我们党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特点是：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52页。

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革命的长期性，伴随而来就产生了我国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曲折性和持久性。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过程中，制定了完备的切合时宜的土地政策，有步骤地、极为圆满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的作法和基本经验是：（1）根据各个革命发展阶段敌友情况的变动，相应地改变解决土地问题的策略和政策。当革命主要是反对国外敌人的时候，实行的是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当革命主要是反对国内敌人的时候，实行的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是彻底的土地政策（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曾交替地实行了上述两种形式的土地政策，目的是一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2）贯彻土地政策，我们不采用单纯由人民政府颁布法令的方法，而是采取上下密切结合的方法。即在党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并且，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过程中，首先把农村中的革命先锋——雇农和贫农，单独组织起来，使其成为农村中的骨干力量。这是因为，土地制度的改革，只有依靠雇农、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经过广大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3）农民的土地斗争必须同改造农村旧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政权，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农民才能真正得到解放。（4）在土地改革斗争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当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之后，要号召和领导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在私有经济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这种

劳动互助组织，已初具社会主义萌芽，从而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为将来引导农民一步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党的土地政策的贯彻，不只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实践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党处理农民问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说是最完备、最成熟的。我们的经验最为丰富，有重大创造，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这是任何兄弟党难于相比的。

第二，关于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经济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应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但必须保持自己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立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论断，发展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策略思想。由于旧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整个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是实行孤立和中立资产阶级的政策，根本不存在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苏联共产党也就没有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

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有很大不同。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限制，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它虽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但其大部分能够积极地参加民主

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而且必须同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是通过这两个联盟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在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由此也表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农民问题，在前面已讲过了。在这里，着重来谈中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即具体地探讨一下我们党怎样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不是天然的，而必须用力去争，以及依靠共产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因此，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是证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极为曲折的。我们党曾同资产阶级建立过两次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两次严重的武装斗争。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特殊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

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上所没有的。

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经验和独特创造是：

（一）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历来不是民主革命的动力，而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但又有严重的动摇妥协倾向，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没有能力和没有资格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我们党对这两部分资产阶级，必须实行截然不同的政策；对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实行孤立、打击、最后把它推翻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实行争取和联合的政策。但需要指出，中国社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一个历史特点是：我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实行长期联合的方针，不仅吸取他们自始至终的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自愿接受我党的领导和改造，同我们一起进入社会主义，使其由剥削者逐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此可见，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深谋远虑的战略措施。

（二）科学地制定了一整套在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策略方针。由于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联合，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就必然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不可能取消阶级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夺取革命的胜利，党确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以下策略：（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即在互助互让、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

立性。(2)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即:对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实行联合,对其革命妥协性和反人民倾向的方面要进行必要的斗争。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包括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又联合又斗争;一种是又合作又分裂,即当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和善于同他们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中立。(3)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根据各个阶级、阶层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经济利益,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又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实行上述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发展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三) 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式上,我们党也有不少创造。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同国民党是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同国民党是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没有固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只是对某些重大问题由两党临时指派代表进行协商。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创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一种统一战线的新形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通过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不仅实现了对同盟者的领导,而且发展、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我党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独特经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第三,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问题。